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〇期 ——  
(二〇一四年七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07b)

---

【史海钩沉】	中央工作组与上海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重新处理	李海文
【当事者言】	保健护士谈江青(续)	周淑英·赵柳恩
【千秋功罪】	代《李作鹏将军画传》序	张思之
【林彪轶事】	毛家湾林彪琐事	李根清
【百家争鸣】	释为毛主席而战	杜钧福
【人物春秋】	陶铸的1966不可或缺李达之死	王炯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 中央工作组与上海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重新处理

• 李海文 •

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从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开始的。1976年12月5日，中央下发了2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通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认为，在上海重新处理这些案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上海直接反对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的人很多，重新处理反对“四人帮”案件工作做好了，可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

#### ◇ 选择典型，以点带面

1976年12月13日，倪志福主持召开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12月5日下发的23号文件和12月10日下发的24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一）》。然后，中央工作组成员严佑民讲话。他对上海市委根据23号文件所作的通知，进行了说明，并宣布了贯彻中央文件应注意的政策。他说：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处理过程中遇到复杂情况时，如有的人主要反对“四人帮”同时还有一些错误言论，处理时要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区别不同情况，由公安、法院、武装部门等组成专门小组处理，或由原单位处理的仍由原单位重新处理。过去特大案件，要经过调查研究妥善处理。处理中认真做好善后工作：一、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对其判决书、口供等当面烧毁。背着本人装进档案的拿出销毁。二、照发工资。三、安排工作，原单位安排，工人回到原单位。四、被逼死的要向家属宣布，有生活问题的给以补助，对亲属子女受到影响的应消除。

党委加强领导。问题多的单位，党委有一人专门负责。上海造成问题责任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不在于办案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1977年1月11日，上海市委专门成立贯彻23号文件办公室。各级党委迅速传达、学习中央23号文件和市委文件，领导挂帅，成立了专门工作班子，普遍进行排除分析，作了重新处理。

“文革”十年中，上海人民反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斗争情况，中央工作组心中是有数的。清查工作一直与揭发批判同步进行，简称“揭、批、查”。严佑民等一到上海，很快领导清查了经过市公安局处理的2500个案件，这还不是全部。一些案件起名为“防扩散”，因“四人帮”确有许多污点，所谓“防扩散”就是不准扩散，防止扩散、传播“四人帮”历史上的丑闻。粉碎“四人帮”前，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只准写上诬蔑中央领导，不准写具体内容。这些“防扩散”案件，反对“四人帮”的占40%至50%。市委、市革委的专案办公室39件“防扩散”案件中就有22件是反江青的，有6件是逼供信造出的假案。这仅是已发现的案例，全市各个单位还有更多的冤假错案。有清查任务的单位数不胜数，仅以纺织、机电、化工、冶金、轻工、仪表等10个局，对所属1863个基层厂调查，就有873个厂有清查任务，约占47%。中央工作组的人员有限，从何入手呢？

苏振华指出：“及时发现群众中好的经验。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是搞运动、抓工作的必要方法。”会后，严佑民和办公室人员研究，选择了三个典型，以点带面。第一个是王洪文起家的十七厂；第二个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七一一所，这个所1968年参加“炮打张春桥”（指贴反对张春桥的标语）的人比较多，受到迫害的人也多；第三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三个单位情况不一，但都是重灾区。

中央工作组指导十七厂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

◇ 初步摸清因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到迫害的对象

一开始，十七厂的各级干部中，对贯彻中央23号文件有不少想法。一些人认为“我们厂里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对象难找”，“落实中央23号文件没啥好搞的”。于是，中央工作组人员专门组织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认真学习。经过学习，不少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说，十七厂是“四人帮”反党分子王洪文的老窝，他们排斥异己，大搞法西斯专政，苦心经营了十年，干部、群众早已恨之入骨。在十七厂贯彻落实中央23号文件精神，十分必要、十分及时。

中央工作组通过四个渠道进行调查研究：一、举办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学习班，组织大家对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审查，以及受党纪等处分的156个对象，逐个排队，并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判刑、戴帽、定性等的77个对象；二、同过去办案人员座谈，请他们提供对象线索；三、从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

亲信的大字报上搜集情况；四、通过一些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材料进行研究分析。

通过以上反复排队分析，内查外调，初步摸清了过去因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到迫害的对象，分三种情况：

一是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员都对“四人帮”的丑恶底细有所了解，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被打棍子、扣帽子，受到种种政治迫害。

二是过去被怀疑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这些人员从学校分配来厂，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怀疑参加过1968年“炮打”张春桥的“四一二”事件，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三是本人虽然过去没有反对过“四人帮”，但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受到迫害的。

#### ◇ 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群众大会

在了解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中央工作组人员不急于具体处理，而是运用这些材料，对“四人帮”及其余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工作组在几个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中，选择了马骥为典型，召开了有4000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群众大会。共产党员马骥，原是厂保卫科的干事。1969年新党委成立时，他对王洪文、唐文兰的野心和在厂里的所作所为不满，没有投王、唐的票，之后又公开具名写信给市委反映王、唐的问题。王、唐对他恨之入骨，抓住马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站错队这个“辫子”，以追查所谓“匿名信”为名，动用专政工具，将他隔离审查，把他妻子也送入学习班，大搞逼供信，抄了他的家，还派人到他的儿子、女儿、弟弟的单位进行诬告陷害。马骥长期被下放劳动。此次大会宣布了对马骥等人重新处理的决定。

工作组着重了解被害人、办案人以及当时参加活动的人员的思想情况，做仔细的思想工作。受迫害者对具体办案人员也很气愤。有的被害人与办案人员是死对头，情绪十分对立，几年来一直见面不讲话。现在，原来的一些办案人员也顾虑重重，他们听到要重新处理这些案件，怕追查责任，搞到自己头上来。另外一些当时曾参加批斗被害人的人也有顾虑。工作组针对这些人员的思想，分别情况，积极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

#### ◇ 认真落实政策

认识统一后，就要落实政策。

第一，销毁有关材料。按照市委〔1976〕29号文件规定，工作组把原受迫害者的检查、交代、批判会记录、大字报稿等全部材料，整理集中起来，编造材料目录。在有工作组、复查小组人员和受迫害者一起参加的会议上，当面把材料清点过目，当场予以销毁。销毁材料的目录不放入本人档案。

第二，恢复名誉。由党委署名，为每个人专门写了一份重新处理的决定，以肃清影响，恢复名誉。充分肯定这些人员当时反对“四人帮”的言行是正确的，“四人帮”搞迫害是严重破坏党纪国法的，鼓励他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第三，适当安排工作。对受害人员的工作，由党委讨论，作出适当安排。马骥原来是干部，

后来被迫害下放劳动。运动中，先把他调上来，在帮助促进党委头头的学习班里作为一名骨干来使用。有的人调上来参加大批判组的工作；有的人身体有病，待恢复健康后，安排适当的工作。

#### ◇ 七一一所先抓“人头”（思想）

七一一所是另一种情况，没有派工作组，平反工作由七一一所党委领导。

1968年4月，“‘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七一一所的群众刷出大标语、发表声明，支持了这一革命行动。张春桥及马、徐、王等人，说“‘四一二’炮打就是反革命事件”，还诬蔑七一一所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桥头堡”，等等。他们扬言要砸烂“桥头堡”，揪出“马蜂王”。王洪文叫嚣：“像田震环这样的人不打倒，上海工人阶级就没有本事。”于是对所革委会原主任田震环等人进行关押达3年之久。经马、徐、王批准，被隔离、抄家的干部和群众达30多人；经所、室二级点名批判，勒令检查交代的有52人。至于受到影响的在全所14个党支部中每个支部都有一批，许多人在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遭折磨长达8年之久。不仅如此，他们借口清查“五一六”分子，整了另一部分群众和干部，将近80%的党支部书记靠了边，甚至对所原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停职审查。

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使七一一所党委在贯彻中央23号文件时，起初存在一个“怕”字，认为受迫害涉及的人多、面广，矛盾复杂，担心大张旗鼓地重新处理，弄不好要引起派性回潮，群众对立。因此，只想依靠专门工作班子，按照文件规定把材料处理掉，开个会讲一讲，个别做一做工作就了事。经过学习中央、市委两个文件和市委领导的讲话，对照、分析了所的情况，所党委思想开了窍，深深感到造成“老大难”问题的根子，就在“四人帮”和马、徐、王。现在要解决“老大难”问题，也必须把斗争矛头对准“四人帮”和马、徐、王。

在所党委工作班子中有的人认为，先打开材料，理清后处理掉，好满足群众的要求；有的人认为，材料是“死”的，人的思想是“活”的，不消除思想里的影响，即使材料处理了，也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底是先抓“人头”（思想），还是先抓“纸头”（材料）呢？所党委反复领会中央、市委文件精神，进一步认识到：贯彻中央23号文件，必须把人的思想工作做好了，“纸头”上的材料才能处理好。于是所党委和工作班子人员，带着中央和市委文件，分别到全所14个支部中去，同支部领导成员一起学习文件，传达党委的要求，听取意见。同时，了解研究各种人员的思想动态，并直接找受害深的20多名人员谈心，做工作。

这时，群众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批评党委贯彻中央文件行动缓慢，希望快点处理材料；另一部分人则不同意。此时，七一一所五室和其他室的部分受迫害的群众，酝酿出“海报”，要在食堂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罪行大会，而另一部分原来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则对召开这样的大会表示“不放心，不参加”。

党委掌握情况后，明确支持广大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同时又表示应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开好这个大会。所党委主要成员兵分三路做工作：一是由所革委会原主任田震环分别找受迫害人员谈心，听取意见，引导他们增强党的观念，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积极支持党委开好大会。二是由党委主要领导先后两次召开各组室负责人、支部书记会议，同受迫害的部分群众一起研究商讨，把原揭发、批判稿中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删掉。三是分别到原来不愿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中做工作，向他们阐明揭批“四人帮”是斗争的大方向，教育、鼓励他们积极投入斗争中去。经过做工作，把各方面人员的不同想法，统一到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和马、徐、王这个斗争上来。

#### ◇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平反工作

上海市出版系统是“四人帮”及马、徐、王直接插手控制的地方，谁反对他们或表示不满，就会遭到残酷镇压、疯狂迫害，受害人很多。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平反工作也由单位党委领导。党委首先抓组织落实和排队摸底。党委决定：由一名书记、常委、党委委员、编辑室支部书记，组成社一级贯彻中央23号文件领导小组，同时抽调10名干部组成工作班子。各基层支部也相继建立专门工作班子，由一名支部负责人员具体抓这项工作，参加工作的有过去的办案人员，也有受“四人帮”迫害的人员。

在初步摸清情况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举办了工作人员学习班。通过学习，大家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党委提出在1977年1月20日左右先解决20个人的问题的要求。学习班一结束，工作班子立即行动。以原处理单位为主，现在所在单位主动配合，以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为重点，先个人（即单个案件）后集体（即牵涉人员较多的案件），抓住重点，查阅档案，召开各种座谈会，同本人谈话。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选出7个案件共14名人员，作为第一批重新处理对象，党委连夜召开会议进行讨论。1月26日，党委召开了第一次贯彻中央23号文件、揭发控诉“四人帮”罪行的大会，宣布对受“四人帮”迫害的人给予重新处理，恢复名誉。

基层单位有人提出：“公安局过去发反革命的案例，征求群众意见，现在同样可以搞革命的案例，应发给群众讨论。”出版社党委接受了这个意见，连夜赶编材料，发给群众进行讨论，征求意见。这样做，群众很欢迎。在讨论中，广大群众不仅对案例提出许多建议，而且对材料中使用的语言，也提了很多意见，对党委很有启发。

会上，几名受迫害的人和一名受迫害致死者的家属，控诉、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被迫害致死的柴庆祥的女儿，原来在发言稿中要求追查是谁逼死她的父亲，并点名批评基层单位领导和具体办案人员，经说服后删去了这样的言词。开过会后，群众普遍反映几人的发言“揭批有力”“控诉感人”“姿态很高”，“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对领导、群众、办案人员今后掌握政策都有意义”。群众普遍反映：“这个会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成功。”“如果‘四人帮’上台，不知有多少人头要落地。”

在做好被迫害人员的思想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工宣队、军宣队人员的工作。因为有些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员过去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处理工作，群众对这些人有意见，一些工宣队、军宣队人员因此产生灰溜溜的情绪，认为“这次运动是搞我们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贯彻中央23号文件工作，就要受到一定的影响。为此，党委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人员座谈会，举办全体工宣队、军宣队人员学习班，帮助他们中的一些同志解除了思想顾虑，促使他们也积极起来揭发问题，同“四人帮”及其余党作斗争。

#### ◇ 严佑民在经验介绍会上的讲话

三个典型单位的重新处理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严佑民要这三个单位写出经验介绍，同时将自己的总结交给办公厅。1977年2月22日，他提出：请毛联钰同志安排常委讨论一次。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十分重视这项工作。2月下旬，他们召开常委会讨论了这三个典型经验和严佑民在经验介绍会上的讲话。

2月下旬，召开了有各区、县、局、大专院校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党委分管该项工作的书记

及工作班子的负责人约300人参加的会议。十七厂、七一一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代表介绍经验。最后，严佑民讲话。他说：

据工交、财贸、文教、科技、地区、郊区几个系统初步统计，过去纯属反对王、张、姚“四人帮”而受迫害的案件有3000余件，主要是反对王、张、姚“四人帮”而又犯有其他错误的案件有1000余件，合计近5000件（不包括有些大案、集团性案件中受迫害的人），现已重新处理了15%左右。一些单位领导抓得很紧，贯彻行动快，措施得力，效果较明显。

他指出，存在的问题是：工作发展不平衡，有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的有“怕、难、等”思想，举步不前；有的工作简单化，由少数人凭印象“拍脑袋”，不走群众路线，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心中无底；有的有单纯任务观点，结案了事，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忽视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妥善处理，效果不好；还有少数单位没有紧紧抓住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纠缠于某些一时还搞不清楚的历史案件，使这项工作的进展遇到一定的阻力和干扰。

严佑民说：中央和市委文件已经下达两个月了，应当抓紧清理。

最后，严佑民再次强调加强领导是做好重新处理工作的关键，并引用毛泽东的话：“不但一定要抓，而且要抓紧。”

经过一年紧张的工作，1977年12月，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工作结束，全市复查平反受迫害的党员、干部和群众10500余人。对被拘捕、判刑的281人全部撤销刑期予以释放；立案审查的3759人被解除了审查；作组织结论或鉴定的3252人被取消了组织结论和鉴定；对受批判的2892人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了是非，消除了影响；原受党纪团纪处分的407人全部被撤销处分，本人的交代和结论材料当面销毁；没有工作的重新安排工作，已死亡的认真做了善后工作。

□ 《党史博览》 2014年第5期

~~~~~

## 【当事者言】

保健护士谈江青（续）

• 周淑英 • 赵柳恩 •

（上接 z k 1 4 0 4 b）

### ◇ 江青的医疗保健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江青对日常生活要求如此苛刻，据你们观察，她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比如她经常需要吃药么？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从江青病历及观察她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她确实有病。五十年代一些疾病和特殊的治疗造成她从中年就进入内分泌严重失调。一般中老年妇女内分泌紊乱是渐进的，还会有出汗、心慌、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而江青突然进入这个状态，对精神和身体打击很大。她曾说过当时眩晕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自己不能起床；经常出大汗使她十分怕风；而失眠使她多年来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对声音也格外敏感。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经

过十多年来多位医护、服务人员的有效的治疗和精心照顾，到我们为她服务时，她身体状况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我接手保健工作时江青53岁，那时她没有出现过眩晕等症状，饮食、日常活动都很好。她对感兴趣的事如骑马、摄影、玩桥牌、逛公园等，几小时都能坚持。可是她并没有动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如穿衣服系扣子等。延续下来的护理方法仍旧照做，一些苛刻要求也丝毫不变，对她的这些作为我是想不通的——这哪像共产党员啊！

赵、周：江青曾诬陷我们给她吃的药是毒药，为此大闹政治局。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我们接触过参与江青医疗保健的专家有吴阶平、卞志强、吴洁、曾诚富、黄宛、洪民、曹家信、孙震寰、高辉远等。305医院院长，曾经做过毛主席保健医生的徐涛，后来也在江青这儿工作过。

江青用药的种类和剂量，是由吴阶平召集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反复商讨制定的。根据江青的身体状况、睡觉情况，制定的处方既科学，又安全，能诱导她安然入睡。对药物疗效和副作用都充分考虑到了，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会诊后制定了用药处方，之后吴阶平将专家组讨论的方案报告江青，她看后表示同意。每日镇静和安眠药总剂量是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绝不会超剂量。

赵：江青的药大致分三类，一是保健类，包括西洋参、复合维生素等；二是助消化的多酶片等；三是镇静、安眠药。取药是到政治局委员专供药房，不到这个级别的领导，必须要中央特批才能到这个药房取药。工作人员不允许用这个药房的药。每次取药必须要两人同去；药量严格按大夫的协定处方。药瓶火漆封口，火漆上还盖着专用章。而且取回的药量大致限制在什么时间段内用完。这些都是保证用药安全的一套措施。虽然江青镇静、安眠药吃的次数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有些是将药片研成粉末按不同剂量装在胶囊里。这是医生们和药房针对江青的身体状况制定的用药方式，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周：吴阶平是我在江青处接触最多并给我们指导关爱最多的医生。吴大夫医德高尚、知识渊博、待人谦和，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相处，组织协调能力强。毛主席、周总理晚年医疗抢救组都是由吴大夫负责牵头组织的，直到两位老人离世。从1968年开始，江青医疗方面的事就找吴大夫。吴大夫讲话深入浅出，语气平缓，江青见他不紧张，外出到海南岛、上海都请他同去。有吴大夫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当江青在医疗上刁难人时，他的承担和解释往往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

大家与吴老的关系非常融洽，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趣事。那次去上海，吴老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交了饭费后没剩多少钱，吴老只好借钱，我们把口袋里的钱包括硬币都凑给了他。回到北京，吴老拿出他的记账单，逐个还给大家，连硬币都分文不差。那时候，大家不管在京还是出差都按制度办事，按规定交纳伙食费，连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也不例外。

1999年3月我们到吴老家看望他。提起过去那段工作经历，吴老用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提到在毛主席生病期间，医疗组日夜守候尽职尽责。江青不但不感谢医务人员，反而威胁说“苏联有个‘白衣党’（指为苏联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专门害人，我看主席身边就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医护人员人人自危，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当着总理和其他人的面对江青说：“如果说我身边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这才使江青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

为高级领导人治病的医生，本来都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权威。而为江青请来会诊和专

科治疗的专家，不知原来是否了解江青的脾气秉性，见面后江青多疑审视的目光、尖刻的言语和苛刻的要求却常常使他们望而生畏。

举几个例子：

有次会诊，北京医院内科吴主任由于紧张，双腿抖个不停，直往人后挪。

还有一次，301医院曾诚富主任要为江青听诊，江青怕掀被子受凉，又怕听诊器凉，使曾主任无法听诊心肺，只好回医院取来一个有扩音装置的听诊器，小心翼翼地隔着被子听诊。

有一个时期，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专家为江青治疗牙周炎，搬来口腔科专用椅和器械，治疗效果很好。江青有一颗牙已松动，她本来同意拔牙，但又说大夫“太紧张了”她不放心，就请周总理和康生与大夫面谈以了解情况。总理听了汇报治疗方案后安慰大夫说：“不要紧张嘛。”后来江青的病牙被顺利拔出。两位专家为了给江青治牙病，在钓鱼台住了近两个月，江青非但不感谢，反而讥讽说：“你们牙科大夫只能看那二三十颗牙，连咽喉病都不会看，算什么本事？我看要革你们的命！”后来还诬陷两位口腔科专家给她吃了毒药。

睡眠是江青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请来中医老专家孙震寰为江青调理。孙老诊脉后开出药方，药煮好后，她只尝了一口便连呼“太苦，不能喝！”孙大夫想用针灸改善她睡眠，江青干脆拒绝了。孙老只好提出用按摩和指压穴位法治疗，江青同意了，还让护士跟着学。江青的几番折腾使孙老越加紧张，头上脸上都滴汗，呼吸都不均匀了。治疗了一段，江青提出护士也学得差不多了，大夫可以不来了，孙老如获大赦赶紧走了。

这些国内、军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多年为首长看病、治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江青看病却艰难棘手，正如曹家信主任说的：为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

赵：有一位化验员曾多次为江青采血，每次来她都会紧张得手抖。有次采血前她手抖得厉害，我怕江青发现，连忙在她前边挡住江青的视线，让她顺利完成采血。因为江青如果发现她紧张会起疑心：为什么见我这么紧张？心中一定有鬼！

周：从这几位的经历，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工作，会是一种什么心境。随便举个令我们工作中为难的例子：在开会时为她送药。因为担心沾上涉密嫌疑，我们尽量不进入会场。但是江青对吃药特别警觉，她的药必须是我们亲自送，别人送她是不吃的。所以怎么既避嫌，又保证她按时吃药，是很伤脑筋的。相比之下，周总理在这方面就坦然得多。有次，总理的医生让我给江青送药时把总理的药也带进去。我把小药瓶儿递给总理，告诉他大夫说您该吃药了，总理接过药瓶，把药倒在手心里，一口水就将药送下去了。周总理对工作人员的信任，使我心里感到温暖。

赵：有一次江青在福建厅开会，那天可能她在政治局里面闹得不愉快了，一下子生气了。服务员跑出来对我说：“你赶快进去，江青同志在里面发火了，她说你没给她吃药！”我赶紧进去。当时纪登奎坐在她旁边，我说“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事？”她怒视着我：“我的药到时候你为什么没给我吃？”我说“刚吃完啊”。“什么时候给我吃完的？”我就说“你跟这位首长（指纪登奎）谈话的时候我给你吃的”。那时候总理和政治局其他人都在，都瞪着眼睛看着这边。江青自己觉得没趣，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进来给我换衣服？我出了一身汗了！”我赶紧说，“那现在给你换吧？”我们那时候谁敢跟她顶啊？实事求是地说谁也不敢跟她顶嘴。我们就去卫生间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她说“这些事情你应该主动地进来”。我心里想你开政治局会议我敢主动进来吗？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 ◇ 护士的行头

李：她这些衣服你们还都随身带着？

赵：是啊。开一下午会，她得换好几次，换下来的来不及洗，我们就马上给熨干（到哪儿人家都得给我们准备电熨斗），不然再换就没有干的了，回去以后才能洗，也是我们的事。我们每次出门都得拿什么？衣服包、水箱、氧气箱。装衣服的是一个大包，除了几身内衣还有薄的丝绵的棉衣、小毛巾、她吃的药、酒精棉球等。

随车还得给提着水箱，里面放两个小保温壶，一壶是凉白开水，一壶是开水，还有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搁有茶叶，准备随时她要水喝都可以给她。到哪儿去，不管在车上，电梯里，走廊，她说喝水马上就要喝。

一次去大会堂开会，刚进了大会堂，江青突然说“我要喝水！”小周说“那我赶紧回车里给您拿吧。”江青说“不行，来不及啦！”小周说“要不您到厅里喝？”“我渴啦，不行！”小周忙跑到楼下拿来水，双手递给她，江青嫌晚了，火冒三丈，啪，连杯带水扔到小周身上！

周：在场的大会堂服务员和警卫人员都很惊愕。江青进入会议厅后，他们过来安慰我，我强忍泪水一句话都没说。就差几分钟她就等不得了！她经常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

江青做过心电图，心脏没有问题。而那时期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有时心脏供血不好，医护人员就带氧气箱备用。她一看总理有氧气箱，就说“我也得准备”。于是叶群帮她从西郊机场弄了小氧气箱随身带，定期到机场换气。从此行头中又增加了氧气箱。

赵：后来还在卧室外放置了大氧气瓶，连接一条长管子，定时向卧室送氧。

除了小周说的那几样，还有一个鞋箱子呐。提篮式的，放个五六双鞋吧，到什么时候情况之下她该穿什么鞋，立刻可以拿。这些东西护士都得给准备好了，要不然到时候她要，没有，就得发火。那年去广州会见维特克时天很热，她一定要随身带着乔其纱的连衣裙。可是随身带就会叠得全是褶，所以就挂在车上。江青不满意：“我身上随时都出汗，还不给我换连衣裙？”骂了一通。结果那次另一位护士治了她——好吧，你不是要我随时拿着、随时给你换么？她手里就举着那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你走哪儿，我就这么举着，最后江青自己回头看见了说“是不好看啊，怪不得你们不愿意。算了，还是放回车里吧，我换时随时拿来就行。”那是啊，你说那样雅观吗？其实那个护士是故意的，举得特别高，就是让大家看着。

#### ◇ 服饰与发型——“女人江青”

李：说到鞋和衣服，我想咱们谈谈另一个话题，“女人江青”。我想，江青无论怎么政治化，怎么强势，到底应该有女性化的一面，就是所谓的“婆婆妈妈”，比如她的服装、发型、化妆品、首饰等等，请您二位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赵：刚才说过，她从来不化妆，也没有化妆品。她不喜欢首饰。曾说过：不喜欢那些珠光宝气的东西。在她的房间和手里面我们没见过一件首饰。她只有两块瑞士进口手表和一块怀表。

外国元首送给主席的或是送给她的东西，都统统上缴礼品库了。服装方面，常穿的有十几套吧。两三套西装，几套中山装和军装。夏天穿的衣服就有几件乔其纱的短袖衣服。有两件棉

睡袍和几件棉睡衣，大部分是在苏联治病时做的，都旧了。大衣有三四件。有一套灰派力司中山装是用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穿过的衣服改制的。江青说“主席总也不穿，给我拿去改吧”。还有几件连衣裙（当时叫布拉吉）。她一般就穿纯棉的，化纤的、尼龙的一概不穿。

周：她的西装是灰颜色华达呢的。棉睡衣一套绿的薄一点，黑的厚一点。一件小薄呢子灰大衣，办公的时候经常披一披。因为她怕风，叶群给她做了件军绿色带帽子的毛凡尔丁小大衣。

赵：常穿的鞋子也有十几双，许多旧的老式皮鞋都不能穿了，放在中南海库房里。江青穿三十五码的鞋，她穿鞋有个特点，因为她有个脚趾畸形，所以绝对不穿前面露脚趾的鞋。有一年，我穿了一双东北出的带两条杠的凉鞋，胶底白帆布面的。她一看，“哟，你这双凉鞋看着挺舒服，我试试”。她试了一下，就让鞋厂定做两双。前面要封口的白帆布鞋。

周：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她看了合意就试穿了一下，然后就拿这鞋到鞋厂，照样做了一双黑色的皮凉鞋，夏天一直穿。江青的脚是“解放脚”。她跟我说过，“我就是有反抗精神，给我裹了脚以后我就放开，再裹还放”。但是对走路还是有些影响，不那么平稳有力。

有次我穿双塑料拖鞋，她看了：“哎呀，你这鞋好，我这鞋太大了，咱俩换吧”。她就和我把拖鞋换了。

由于地位的限制，她出门去商店不方便，因此见到的商品很少。1968年她曾去过一次王府井百货大楼，受到不少群众围观，只好匆忙离开商店。这也使她在选择着装时经常参照周围人的衣着。

赵：有一段时间，她说“出门也不能穿得这么死板，也穿点花衣服嘛”。这样就买了一些素色小花和小格子布，要我们陪着她一块儿穿，“你们做两件衬衫吧”。那时候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谁也不穿便衣。她穿花衣服出去，我们只好穿在里面，外面穿军装。后来又要我们陪她穿裙子，我就穿条黑裙子陪她，因为她要穿你就得陪着她穿。

李：她那衣服有打补丁的吗？

赵：睡衣有补丁，毛裤也很旧。她的外衣有几件破了拿去织补以后，外表看不出来。她几十年前穿过的衣服都盛在那几个旧皮箱里，这些旧衣服每件都有账。常穿的衣服，连两米宽的壁柜都没挂满。丝绵被和几条毛巾被也是旧的用了很多年了。毛巾她喜欢用最旧的，旧的软，吸汗，用着舒服。用的量很大，一擦一擦的。

周：她让把主席用过的旧毛巾都拿过来。出汗多时来不及换衣服，就用小毛巾垫在前胸、后背处暂时吸汗。

李：她穿的衣服有没有什么美国、法国、意大利生产的？

赵：她没有外国名牌服装，她的衣服多在总后服装研究所或红都服装店做。

周：我记得秋裤是到北京市针织总厂定做的，有长有短，就是随着天气变化而定。我在那时她穿的都是黑色棉纱袜，袜子有长短两种。我们把袜子和秋裤分别钉上按扣，扣上后袜子就不会滑下去，可防止腿部受凉。

李：她比较注意舒适，不讲究什么其他的，是吗？

赵：对，她特别讲究舒适。也很注重仪表，口袋里放一把小梳子，经常梳梳头。她说“我出去要大方得体”。

李：江青很多照片都戴帽子？

周：她出汗多，怕风吹后受凉，外出时都戴帽子。北京饭店的朱师傅给她理发。江青的发型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有人说像男人发型，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擦汗，后边头发只好推短。而鬓角头发留的较长可梳到耳后，还是保留了女式发型。“破四旧”以后，普通理发店烫头发的东西都没了，人们也不烫发了。江青要烫发，当时北京饭店还有给外宾用的烫发用品。朱师傅把东西都搬来，在17号楼给她做头。给头发烫出几个大波浪，擦汗后就不那么散乱了。朱师傅每次来都是小心翼翼的。有时江青说不行今天有汗，只好改天再来。朱师傅给她做完头以后，很怕她感冒。他说为江青做一次头，一个礼拜都不放心。

李：多长时间做这么一次啊？

赵：起码有半年左右。

◇ 看电影——江青每天必做的功课

李：我们都知道看电影是江青几乎每天必做的功课，请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情况。

赵：江青喜欢看《出水芙蓉》《简爱》《红菱艳》等电影。江青常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坏了，睡不好，吃不香，我要休息，脑子转移一下了。”“转移”是她的口头禅，我们都明白这个词的含义。“转移”的主要方式是看电影、照相、听音乐、骑马，有时打桥牌。看电影是她每天最后一项活动。那时会议常开到深夜，散会后还要再看电影。

周：江青说：“我看电影是为了借鉴国外艺术，这是工作。”影片主要是从电影资料馆调来的馆藏国外三四十年代的老片和“过路片”（一些国外片子在国内停留一段时间，不购买再转走）。江青说三四十年代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片子好看。当时和江青一同看电影的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有时请了康生他也不一定来。17号楼电影厅旁有个小休息厅，江、张、姚常在那休息。有次我给江青送药时，听到江青夸奖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说“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赵：有时她自己点片名，工作人员也帮助挑选。有些电影看后觉得可以放松，有利于睡眠，就会经常看。工作人员要熟悉这些片名，她随时会提出看哪部，如听不清或记错了，影响她情绪和休息就“犯大错误”了。两位放映员就更熟练了，江青提出看哪部片子中的哪一段，他们都能立刻找到。

周：我记得江青常看的影片有：《乱世佳人》《恨海香魂》《农家女》《孤星血泪》《煤气灯下》《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瑞典女王》《茶花女》《深闺疑云》《红袖倾城》《蝴蝶梦》《巫山云》《翠堤春晓》《鹿苑常春》《风流女窃》《巴黎圣母院》《罗马假日》《百万英镑》《美人计》《鸾凤合鸣》《悲惨世界》《音乐之声》等。过路片有《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啊！海军》等。有时她指名看某位明星主演的片子，如：英格丽·褒曼、贾里·古柏、琼·方登、嘉宝、泰伦鲍华、费雯丽、派克、秀兰·邓波儿等。影片中人物对话少数已译成中文，多数为中文字幕，有些过路片是原文的还要请人现场翻译。

李：外边传说江青常看“黄色电影”，这些电影也算不上什么黄色。

赵：由于文化差异、国外片有些搂抱啊、亲吻、穿三点式的镜头，这些在当年是犯忌讳的。不同历史时期看法会不一样，但并不是什么“黄色电影”。

阎长贵：记得1967年夏天，工作人员给她选了部名叫《广岛之恋》的法国影片，事先也没看。片子开头就有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火了：“怎么叫我看这样的片子？”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不过这次她并没追究谁。我并不是说《广岛之恋》是黄色电影，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其故事和内容都不知道。

李：看来，江青对所谓“黄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赵：她感兴趣的是三十年代的一些片子。她特别喜欢摄影水平高的、演员演技好、风景美、音乐好的影片。

周：看电影还惹出一场风波。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她看了电影《格雷的画像》。内容梗概是：主人公格雷请一个会魔法的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画像中有他的灵魂，格雷因此会青春永驻。画家告诉他不能干坏事，否则画像会变丑，坏事做的越多脸就越丑。格雷做了许多坏事，画像渐渐变丑，而格雷面貌毫无改变。当格雷最后一次进入藏画的密室时，发现画像如魔鬼般丑陋不堪。他在惊恐中拿刀扎向画像，随之本人也死了。深夜，江青看完这部片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无法入睡。不断打铃，把护士、秘书、警卫全都叫到她卧室。我们进去后，看到她抱着头在床上痛苦地来回翻滚，疾言厉色地叫喊：“你们让我看了这么坏的电影！弄得我不能入睡，你们起到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我被这种场面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我们都做了“深刻的检讨”。等她喊叫稍停，大家建议她再看几本《红菱艳》。看了《红菱艳》后，江青才安静下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再选电影大家越发小心谨慎了。江青对这部电影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也使我大惑不解。

李：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赵：她反复看《冷酷的心》，十分欣赏影片的色彩和技术处理。她看电影有个习惯，比如说今天想睡个好觉，就挑片子中有轻松音乐的那段。

周：江青忌讳有蛇、鳞的画面。因此凡是遇到有蛇、鳞的画面，放映员事先要将这个画面遮挡一下，时间掌握得十分准确。看电影是江青一项重要活动，样板戏拍成电影后也在17号楼审样片。放映员技术堪称一流，从未出现过差错。17号楼的通风、温度也要和江青住处一致。放映员和服务员全天守候在岗位上，工作小心翼翼，十分辛苦。

李：说到电影，我们知道，江青是电影明星出身，文革中，她对这段历史十分忌讳，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销毁历史资料、迫害知情人。您对此有所了解么？

周：我经历过这么几件事。1968年春的一天，在11号楼二层，江青按铃叫我给她换衣服。进了她办公室，只见室内一片狼藉。桌面、沙发扶手、睡榻上到处都是照片、报纸等。我工作中信守的原则是对办公室的东西不看。她把睡榻上的东西挪了一下，坐在中间，我给她脱衣服擦汗。忽然她盯着我的眼，我请她抬胳膊擦一下腋窝，她却转身把照片翻过去，忙用衣服遮挡了。我收拾衣服时，看到掉在地上一张照片，能看得出是江青年轻时的照片，忙捡起放在睡榻上。她敏感多疑盯人的眼神，使我忙抱着湿衣服赶紧离开办公室。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江青进了二层一间门朝南窗向西的小房间，不许别人进。一会儿烧东西的烟味飘到楼道，越来越浓。过了很长时间，江青出来了，她头发散乱全身烟味，衣服被汗水湿透。事后打扫卫生的同志说西边窗户大开，大花盆里的纸灰都满了。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江青发话让 11 号楼全体人员，在第二天上午她起床前时组织学习。学习材料有两个，一是鲁迅的《论人言可畏》，二是三十年代蓝苹的一封公开信。大家学习后由于不知时代背景，没弄清事情的始末。江青得知我们一头雾水后，就说“我在三十年代的遭遇就像阮玲玉一样，被反动小报攻击，流言蜚语唾沫星子到处飞。人言可畏啊，阮玲玉了却人生。我要抗争，发表公开信回击他们，我是发着高烧和他们斗争的。现在有人还造谣中伤我，你们太无知了，不要上当！”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江青十分在意并不择手段掩盖三十年代她那段历史。文革初期江青伙同叶群派上海驻军战士，化装成红卫兵抄文艺界曾和她共事过的人的家，所抄到的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书报，作为绝密材料送给了她本人。不仅如此，还关押了一些知情者。三十年代她房东家的保姆秦桂贞，曾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她，就因为了解江青那一段历史被“请”到北京后关进秦城监狱。

□ 《炎黄春秋》2014 年第 5 期

~~~~~

# 【千秋功罪】

代《李作鹏将军画传》序

• 张思之 •

“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

《画传》图真文实，堪比自传，是传主鲜活一生的粲如反映，相当感人。尽管我不熟知他一生的奋斗史，相见也晚；但相识之后即铭刻于心，故敢于相信这里传出了他的风骨、风格与气概。

他毕生忠实于信仰，效力于民众，不料功成之初政治生命即被扼杀，接着又遭癌症不治，其间白白浪费了近 40 年的大好时光。遥想“影”中历程，不禁感慨，能不断肠？

传主是一个敢于违抗军令、临阵决断于辽西平原，率纵队力阻廖耀湘兵团，为赢得全局胜利奠定基础的将军；一个敢于启用小帆船，破汹涌浪涛强渡大海登陆海南岛的前线司令；一个北战南征、善武能文的中共高层政委、高级指挥官；还有——是一个在一场政治斗争中惨遭“阳谋”陷害，被诬为阶下囚的中共政治犯。

然而官阶、职务，出身乃至晚年的沦没，都不足以完整地说明他是个什么人？

我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回答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但我记得他在 2001 年 5 月 16 日对我说的话：“什么战功？当个普通老百姓挺好！”这不是空话，他在治癌期间坚拒优厚条件，忍受病痛极力减少医疗费用的行藏便是新证。至于世人的观感，我听懂了并且信服伍修权将军的评语：“那是一条又臭又硬的汉子！”时为 1980 年 12 月，伍是“两案”特别法庭副庭长、李案审判长，当年红军“过草地”时，李的顶头上司，互识熟知，已非一日。

评得到位，是条汉子！

这条汉子在两案审判中说真话，敢做敢当；不谄过，顾全“大局”；不媚上，一身正气。“是我的，我不推；不是我的，让历史做结论，请留下材料，可以等五百年。”

我有责任说出实际情况：《起诉书》罗列的“两案”主犯48条罪状，除了山海关机场“九一三”放飞林彪专机这一项与他沾边，无妨视为“罪嫌”(!)可予指控外，其余的，或无直接关联，或竟根本无关。即使是“放飞”这项指控，从案卷证据上看，也是强加给他的。试想：面对党的副主席、三军副统帅他说走谁敢拒飞？如无禁令，何来“放飞”？关键的关键是：中南海当夜已经接获林豆豆的适时密报，有权者竟不下令“8341”警卫部队坚决阻拦林氏驱车山海关机场，强行禁飞，须知林车开动之初，“8341”开枪，林彪秘书已然跳车，只是无令力阻，听任专车飞驰专机升空，谁都不敢“妄为”罢了。这，难道应由李作鹏负罪责？当年作为李作鹏的律师，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尽到辩护职责，是有愧于被告人的！

有鉴于情势的复杂，我曾在“两案”审结20年之后面询传主对那场审判的意见，他并不喊冤，只是说：“给两个人打了埋伏。”

“谁？”

“毛和周！”

明白了：也大体清楚了。他在维护着一向敬仰的所谓的领袖威望，这也许是他的另一类“大局”。

诚然，硬汉子不免“臭”脾气，这里所谓“臭”，论者其实并无贬义，或者甚至包含爱意。《西厢记》中屡屡把张生喻为“可憎才”，今日恋人时常嗔对方“讨厌”，都属此。请看，身处囚室，掀翻饭桌，疾呼：“老子要吃肉！”逼得有司拿到毛批三条，送上肉来，才算告一段落。粗看何其“臭”也，细想多么有趣。

待人处事，更见柔婉，尤见情真。《画传》传主留有陈光将军三张照片，均已编入；还忠实地记录了陈光当年被诬时的无奈：“我陈光有什么罪？”还有临“阵”的怒吼——

“你叶剑英有什么了不起？你在我军队战史上没有一寸战功，你指挥过哪一次重要战役？”

.....

留存这些影像信史，何其情深！现在，而今，军中，党内，谁还记起陈光？世上知陈光被诬陷者又有几人？但《画传》传主不接受历史被歪曲。

我尊重、崇敬《画传》传主的性格。我与他，冒昧地说，或属有缘。并无私交却那么相投。我存有医院探病两人热拥大笑的照片，说明病痛生死都已置之度外，与影中人的心应是相通的。

此刻，他在蓝天之上，驾白云鸟瞰。在那里，他会是在没有战争硝烟的一派宁静之中，锻铮铮铁骨，塑坚贞性格，播大爱，扬正气，胸怀宇宙。我期待着重逢，两个决不变质的“普通老百姓”，执手紧握，依然狂笑，泪眼凝视，相拥依旧……

不尽思念，权充小“序”。

~~~~~  
【林彪逸事】

毛家湾林彪琐事

• 李根清 •

◇ 内勤

1964年底，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文儒，一个叫屈真。我去了以后，与刘文儒一起照顾林彪，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誊抄他报送毛泽东、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办工作人员大体分为四摊，即秘书、内勤、警卫人员和外勤。内勤除刘文儒、屈真和我三个人外，还有王淑媛。我们四个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贴身侍卫，所以叫内勤。外勤是指司机、厨师、通讯员、管理员、锅炉工等，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不经传唤不进内宅，所以叫外勤。

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传唤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刘文儒、屈真两人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有一定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唯我是个门外汉。

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文字简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端踏实、极端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时注意。林彪怕风，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风”，他也会设法躲开。但内勤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从不会躲。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尽可能不让风生。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我给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不让饭菜变凉。林彪入睡后，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清扫。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处，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安电铃。在林彪居住的卧室、活动的客厅、走廊，乃至卫生间，都装上电铃按钮，电铃指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一个场所，比如，1号牌是卧室，2、3号牌是客厅，4号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按钮，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

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随着时间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由尊敬变为亲切，由新鲜变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 ◇ 火柴与黄豆

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他正在客厅踱步。李文普对林彪说：“首长，小李从北京来了，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我站着没有给林彪敬礼。李文普告诉我，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与之握手。这样，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手，敬过一个礼。林彪看着我，口气和蔼地说“好啊”，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电铃“嘟，嘟”响了两下，刘文儒告诉我：“首长在客厅呢，你去吧。”当我见到林彪时，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来问刘文儒：“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首长要吃花生糖。给，你给首长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快步返回客厅，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钟，林彪又按电铃了，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从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粘、炒黄豆，有时还吃炒蚕豆。每次只抓两三颗，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由他说了算。

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就是划火柴。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点燃，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

我们专门买一些梗又粗又长的高级火柴摆在林彪客厅、走廊的茶几上，随他去划。燃烧过的火柴梗林彪便随手往地毯上一扔，只要他不睡觉，也不让我们清扫。所以平时不管秘书进来或者有客人来，都可以看见满地的火柴梗。

叶群曾经解释说，林彪打了一辈子仗，忘不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

## ◇ 踱步的学问

踱步，是林彪的一个重要习惯。一天当中，他除去睡觉、吃饭、会客、听秘书讲文件，其他的时间都在踱步。客厅、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北京毛家湾住地有东西两个客厅，面积加起来有近百平方米，东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给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林彪到外地去住，都注意选择环境安静，卧室和客厅宽敞的居所。

林彪踱步慢条斯理，平缓而有节奏。脚下穿一双老北京布鞋，似乎总是故意用脚后跟擦着地毯，每踱一步脚下便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微微低着头，双手反剪，眼睛瞅着脚尖前方一两米远的地方，永远沉思的样子。时而会停下脚步，双臂合抱，抬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时而会擦亮火柴，看着火苗，闻闻硝烟；时而会叫内勤拿点零食来；时而会拿起茶几上的铅笔，在纸上快速地写些什么；有时则叫内勤或秘书来，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从这一点讲，客厅就是林彪的办公室，踱步是林彪办公的一种方式。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客厅、走廊、卧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凡是他能走到的地方都摆放茶几，在茶几上摆好纸和笔，使他能随时随地写下他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一遍他头一天写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会让我记录下来。他认为无用的，就随手往地上一扔，最后我会给他收拾起来送炉膛烧掉。因为林



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瞅纸和笔，因而写在纸上的字常常横不横，竖不竖，龙飞凤舞，字迹重叠，非常难以辨认，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不认得！”

林彪的许多指示，是在踱步中作出的。林彪的许多“黑话”是在踱步中写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的林彪的几次讲话，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构思而成的。

在林彪看来，踱步是休闲，也是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他甚至把“闲着”、“踱着”上升到领导科学的高度，几十年持之以恒。他写道：“空着——即是在想着——不要以为空着是白过，是浪费了时间，踱着、躺着、玩着、静着，皆是在想着……”“忙着——就是没有想，没有可能想，故不可忙。”

“闲着——即是在做思想工作，在进行领导。”

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时候，那就是他自己感觉“生病”的时候。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情绪低落，踱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甚至整天蜷缩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像活死人一般。

#### ◇ 独特的读书法

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卡片内容不是林彪自己选出来的，而是林彪出题目，由秘书李春生从书上查找的。

那天上午一上班，李春生就给我抱来一摞书，有马、恩、列、斯的著作，有《毛泽东选集》，也有其他人的著作。书中夹着许多一指多宽、三寸来长的白纸条，从夹了纸条的地方打开书，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铅笔画的一个个括号，每对正负括号之间的那段文字，便是应该抄写在卡片上的内容，也就是林彪要读的“书”。李春生交待我上午抄完，说下午便要给林彪看。

卡片是专门印制的，64开纸大小，正面上方依次印有“分类”、“标题”、“来源”和“编号”、“年月日”，“内容”以下印有横格，正反两面可以抄写二百多字。不过，很少有写得满满的时候，大部分卡片内容有一百多字，有的只有几十字。

为林彪抄写卡片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的字写得并不好，只是工工整整，从不敷衍，所以林彪愿意让我抄写。有一段时间曾经试用打字机打印卡片，林彪认为不如我写的好，便放弃了。在林办工作七年，由我制作的读书卡片不下万张，都是李春生查找我抄写的。

李春生，江苏常熟人，193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材生，在1964年调林办前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教员，矮个子，极善辩论，常口衔白沫，侃侃而谈，不论马、恩、列、斯的著作，还是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本本”，他都能像背“三字经”一样顺口背出一段，因而秘书们送他雅号“学者”、“小夫子”。由于他常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又被戏称为“眼镜”。1966年8月，张云生调林办后，他被降格为“小眼镜”。因为他常年啃书本，不谙世故人情，不善办理事务，叶群也叫他“书呆子”。

李春生走后，我便一张一张抄写起来。因为要给林彪看，我用楷体抄写，努力写得工整些，每个字的大小、间距都差不多。如果抄错了，我会撕毁重来。

好在每张卡片内容都不算多，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摞书里的纸条就被我抽完了。正当我准备交活的时候，李春生走进来，又给我放下一摞书，要求我抓紧抄写，在下午两点前交给他。

我不敢怠慢，决定放弃午饭。当我在下午两点前抱着书和抄写的一沓卡片放到李春生面前的时候，他又递给我几本夹着纸条的书，对我说，“下午把这些抄出来，”然后指指桌面上还没有夹纸条的书本说：“这些我看完再给你。”

这是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没有吃午饭。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李春生看书的速度极快，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翻书。他既能快速准确地从《马恩选集》、《列宁全集》中找出某篇著作，又能快速准确地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有关论述，然后用括号一一标记出来。听说，李春生的前任李德也有这个本事。

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然后制成语录卡片，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除了读语录卡片外，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表体现出来，然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林彪还用“剪贴法”来读书：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话剪贴起来。据老秘书讲，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大工业、大机器”几个字。

我发现林彪读书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总是围绕着他当前考虑的问题来读书。一个时间段，围绕一个什么专题制作卡片，主要从谁的书上选择卡片内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书只需照他的要求看书，从书中把相关论述查找出来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主要是围绕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这个问题读书。所以，那段时间制作的卡片都是马、列、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有关论述。1965年春他重点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制作了大量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关论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集中的读书活动少了许多，直到1969年初为准备“九大”政治报告，他才一面让陈伯达起草那份《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稿，一面自己着手研究马列主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方面的论述，为自己在“九大”作口头报告做准备。

林彪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他自己读书学习的切身体会。

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什么东西是‘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有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它是用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力很大，使用很少。”“应该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林彪强调：“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地读，要吸收地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彪读马列著作的态度和方法：做书的主人，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啥学啥”，而不是为了“系统”、“完整”而“让书本牵着鼻

子走”。

林彪认为，围绕专题做卡片是读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片法帮他从本本中跳了出来。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说：“经典著作有黑格尔文风，难读。”“卡片办法解决了食古不化、融会贯通、茫无头绪、浩如烟海的困难。早有此法，思想就会更成熟，费力会更少。”

林彪在盛赞卡片法的同时，对怎么看书、怎么选语录、怎么做卡片也有过明确要求。他交待秘书说：“看书做卡片。卡片分两类，一类是基本卡，一类是临时卡。比如宗教、艺术、道德；又如农业合作化等等，可以随时查找，做临时卡。而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的问题做基本卡。”“书主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些著作中主要是看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如生活、生产与消费、技术工具的作用；如论人的作用、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层建筑的作用；社会生活、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斗争；论党、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散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做卡片）把分散的论点按问题集中起来。凡属于同一内容、同一含义的都要，字句差不多的也要，不要怕重复。只有一两条就记不住，有几十条就可以加深印象。”林彪说，这样学力量就够，才可能，不然力量不够，也不可能。这也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林彪从读马列语录中尝到了甜头，因此他就倡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语录。从指示解放军报每天结合头版头条内容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话，到指示总政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武器一样”发给部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是基于他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体会，从当时部队文盲成分多，干部战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决定。士兵和老百姓读毛选四卷有困难，读《毛主席语录》就比较容易。《毛主席语录》是林彪发明的现代《论语》。通过它把毛泽东思想普及给全中国人民，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我抄写的读书卡片到了林彪那里，他会先让秘书或内勤念给他听一遍，然后再精挑细选，反复研读。从我每次给他念卡片的情形看，他听得很认真，对感兴趣的卡片会让挑选出来，只有他让选出来“留下”的卡片他才会自己拿着看。常常是，几十张、上百张卡片读完后，留下的不过一二十张。而当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用自己的双眼阅读这些卡片的时候，又会扔在地毯上一些。经过这样一遍遍阅读、筛选程序剩下来的卡片常常仅有几张、十来张而已，这才是林彪留着自己反复读的“书”，而“书”中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字句是“废话”，他还要甄别。

林彪对他选定的“书”读得很认真，边读边用红油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勾勾连连。有的句子下面画一条横杠，有的画两条横杠；有的在某个字、词上画一个圆圈，有的画两个圆圈；有时把这一句与那一句用红线连起来，有时也会把这个字与另外一行的那个字用红线连起来；有时还会在卡片上写下心得体会，有时也会把心得体会写在另外的散纸上，或者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

所有林彪读过的卡片，亲笔写的或让我们记录下来的心得体会，叶群都精心整理，妥善保存。

说林彪“不看报，不看文件”确实接近事实，说林彪“不读书”或说他只翻药典，则离实际太远。林彪是个爱读书、善读书、善思考的人，读书贯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就拥有私人图书室，有马恩列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史哲学、释儒兵道、农桑医药等等，各种各类的书籍几千册，都是林彪几十年来读过的。叶群视为珍宝，

要我兼管。翻阅这些纸张有些泛黄的书籍，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林彪在书中眉、腰处或扉页上写的读书心得，尤其是在他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中，林彪的批语更是密密麻麻，随处可见。这些批语或是所思所得，或是对书中观点、人物、事件的臧否，都胸臆直抒，毫无掩饰。下面列举几例，可以看出林彪读书的态度：

例一，林彪读《共产党宣言》后写道：“论团结的书。以论敌团结起，以论自己团结终。”

例二，林彪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时，感悟团结与斗争的哲学，写道：“斯氏（指斯大林）有错：只斗不团，只团不斗，皆错。”“只斗其坏部分而团其好部分〔对一个对象皆当又打（坏部分），又拉（好部分）才对〕。”

例三，林彪在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应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林彪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作“为大众主义”，说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

例四，林彪读《大学》和《四书章句集注》时写道：“孰为大（一）格物——万事之首，不脱离实际，（二）民主——治国之首，不脱离群众”，“政治之本为德”，“德为先，爱民为先”，“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是“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

例五，林彪读《毛泽东选集》后写了一个“座右铭”：“反热情主义〔以此语代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易警惕些，并代替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等名词〕。”

林彪认为“最易不觉得犯的错误是凭热情办事，把热情当了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觉的防范热情主义的错误，就能保证胜利。”

他说，“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之区别于人者在凭热情还是不凭热情。”

从以上寥寥数例便可以看出，林彪读书不仅很多，而且不走过场，学而必思，有感必发，有得必录，因而他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很熟悉，常能脱口而出。

#### ◇ “永远健康”的病号

从到林彪身边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断从叶群和周围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林彪一生转战，受过五次伤（叶群说七次），尤其1938年遭阎锡山匪军冷枪，伤及中枢神经，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因而怕风怕水怕光怕声响；见林彪不要行礼，不要主动说话，不要快步从身边走过；林彪召见问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嗦，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林彪的客厅、卧室平时门窗要关闭严实，他睡觉后要保持环境安静，等等。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信号逐渐加强，慢慢成为守则，人人严格遵守，连其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我虽然从未听林彪本人提出过诸如此类的要求，但我发现林彪本人从不反感人们这样做。

在上海太原路住的时候，有一天，林彪告诉我：“你检查一下，是什么声音？”我仔细辨认许久，才听出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啞，啞”声，原来是抽水马桶关闭不严有水漏出来。我看见，林彪显然有些烦躁。

林彪身体最常发生的问题是“出汗”。因为爱出汗，所以常“着凉”，且常伴有低温。林彪

“出汗”不分四时、不论昼夜，随时随地都会莫名其妙地出起汗来。每到此时，林彪便会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一动不动。这时，不管有天大的事他也不听，不论何方神圣来访他也不见，一般两三个钟头以后才会起身重新踱步，或叫内勤来，口述他总结的出汗的“原因”。

下面列举几条林彪20世纪50年代亲自总结的“经验”：

“胡桃吃后背发冷”；  
“茶叶吃后膀胱出汗，容易受凉”；  
“扁豆吃后着凉，青豆吃后出汗”；  
“芝麻吃后感觉不佳，今后禁吃”；  
“过去能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自从吃红豆后有低温能退”；  
“长春吃猪肉后能减少汗，北京吃猪油能使手心出汗”；  
“在上海有一次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感觉身上不很冷了，可见光很重要”；  
“低温时不可刮脸，不可散步（放风），只可穿好衣服起床坐着……”；  
“勿出城，勿坐车，城内城外，车内车外，冷热相差甚远，最易受病。”

类似这样的“经验”林彪几乎每天都在总结，内勤负责记载的林彪的《病程日志》几乎每天都有类似内容。

除了爱“出汗”之外，林彪另一个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失眠。他每天上床睡觉前都必须先吃安眠药、打催眠针，否则便不能入睡，往往半夜里还要加服一次，甚至两次安眠药，或者再打一支催眠针才能睡一会儿。他用的安眠药、催眠针剂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安全有效的速眠类药品，如鲁米那、巴比妥等，但用在林彪身上只有大剂量才管用。

林彪在他的疾病问题上常持唯心主义、片面性态度，不仅使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而且也使他讳疾忌医，因为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而常年深受折磨。我曾多次亲眼看见林彪发病时的情景：瘫痪似地坐在那儿，头倚歪在沙发上，双目不睁，面色煞白，嘴唇紧绷，一动不动。如果有人进来，他就微微抬起一只手掌，简单地摇摆一下，示意不要打扰他。遇到这种情况，内勤会及时向叶群和秘书通报，他们便不讲文件、不报事。秘书们谁也不怀疑林彪是无病装病。

林彪不相信医生，也不知道有保健医生在为他服务。保健医生也从不去见林彪。有人说他相信药典，但我给他当内勤两年没有见到他翻过一次药书。我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他曾经看过的《药理学》一书中写了不少批注，其中一条写道：“中药不可服，错、对，均无案可查，无经验可用。”这说明林彪也不太相信药书和中药。他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经验。1966年春的一天，林彪说青蛤“止汗”，点名要吃福建漳州一带产的青蛤。韩先楚很快派人给弄来了，林彪只吃了两个就不吃了。他总结“经验”说，吃青蛤“手背疼”。1968年夏初，林彪连续几天发生不明原因低烧，叶群与保健医生商量，决定给林彪做一次体检，但是无论怎样劝说，林彪就是不去医院。无奈，只好说服他同意请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来，把X光机等设备搬进毛家湾他的卧室，才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表明，林彪身体内部器官并无大的毛病。但是，林彪的表现依然是一副病态。

林彪1938年那次负伤捡回一条命，但却给他留下终身不愈的病痛。林彪的病到底是什么病，我在林办那些年并没有听说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给下过明确的诊断结论。所谓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解释了林彪为什么对风、声、光、温度等外界刺激反应敏感。保健医生蒋葆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说，叶群曾对她说过，林彪的病是精神系统的病，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只要辞职，不让他当接班人就会慢慢好起来。林立衡说，为此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不当接班人，毛泽东不准。

据我观察，林彪用脑过度，入睡困难，睡眠奇少是影响他健康的一大因素，加之清教徒一样极其简单的饮食，且常年不做调剂，造成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也严重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以致常年体重不过90来斤，50多岁时就像一个耄耋老人。

在当时的中央和军委领导高层，林彪身体不好不是什么秘密。即使在林彪死后，也没有听毛泽东说过，林彪是没病装病，是韬光养晦。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关心林彪身体，支持他休养调整。

在林办的档案里保存着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尾，毛泽东又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毛泽东把他亲笔抄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诗全文寄给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林办档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叫吴法宪索回转送给了病中的康生。

毛泽东对林彪不能主持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也给予充分谅解和关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已成为接班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多次说过“林有病，可不出席”一类的话，或者明确指示让叶群代表林彪开会。林彪本来就不爱参加会议，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也乐得逍遥。

当然，林彪也有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推逃公务的现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过一个星期了，林彪还赖在大连不回北京就是一例。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后，毛泽东召集会议批评他们，林彪不出席也是一例。1970年12月，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林彪说，“斯诺是熟人，见面后他什么都问，不好回答”，于是也以身体不好为由拖着不见。至于平时以身体不好为挡箭牌不开会、不会客的现象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口号，殊不知，林彪是个弱不禁风的病号。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 《炎黄春秋》 2014年第5期

~~~~~  
【百家争鸣】

释为毛主席而战

• 杜钧福 •

造反派不是拥戴毛的乌合之众，保守派也不是拥戴毛的乌合之众，参加文革的所有人都不都是拥戴毛的乌合之众。如果把他们说成是拥戴毛的人，就是把他们说高了，过奖了。因为为毛，为毛的思想而战，不管对错都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而大多数人，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具有这样的情怀。一些领袖人物或许有这样的情怀，但也要十分小心，他们说的未必是真话。

那么，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什么呢？恕我直言，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再多

就是考虑一下明天，自己以及家庭的前途。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叫老百姓。

那么他们为什么那样疯狂呢？

说说重庆武斗，文革中重庆打得血流成河，何蜀先生一部关于重庆武斗的书名是“为毛主席而战”，但是我看没人单纯为领袖而献身。例如在现在的重庆市所属的万州地区，许多武斗人员乐于以此为业。万县地区革委会对于所支持一派人员按月拨付“支左经费”，每人每天一斤米和二角五分钱（俗称“1 2 5”），还有肉票、酒票、烟票、油票、盐票等，武斗人员和宣传队员的标准还要高一倍，（老唐《文革，我心中永远的痛》，老唐新浪博客）如同法国的外籍军团。考虑到当时农村的生活水平，一年的工分最多分几十元，谁不争先恐后地参与呢？

农民可能层次低一些，再说另一极端的“最高学府”。我当时在中关村，很了解北大清华的运动。1 9 6 8 年，北大武斗得很厉害，源于主政的公社派对于对立派的压迫和对立派的反抗。当时对立派一些领袖动员本派学生参加武斗，所说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去反抗，北大就是公社派的一统天下，等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的毕业鉴定写得很坏，留在档案里一辈子不得翻身，而且肯定会被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去。

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批评家们，现在不是兴“穿越”吗？你们穿越一个给我看。先穿越到文革期间的万州农村，你会发现你成了一个农民，只有两间破草房，缸里只剩一把米，喂鸡都不够。这时候，“1 2 5”，以及农村人从未见过的肉票、酒票、烟票摆在你面前，你难道还有选择吗？

你再穿越到武斗中的北大，你面临的局面直接影响你即将来到的毕业分配，它将决定你一生的命运，你又有几分血性，你很难不为自己而战斗。

所以在文革中，尽管人人口喊为毛主席而战，但他们没那么高尚，单纯为远在北京、与己没直接关系的领袖献身，也没那么愚蠢，毛主席发一句话，就像魔咒一样被驱使送命。他们是精明的，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但由于眼光和环境所限，未必是真正的长远利益。

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太可怜、太可悲了。但是不要笑话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也未必强多少。我们还是先为自己的命运悲哀吧。

□ 选自杜钧福博客

~~~~~

## 【人物春秋】

### 陶铸的 1 9 6 6 不可或缺李达之死

• 王炯华 •

赵庚先生 3 月 3 0 日在共识网发表《陶铸在一九六六》（见本刊 z k 1 3 1 2 b ——编者），讲的是 1 9 6 6 年 6 月 1 日陶铸赴京履新后事，属于 1 9 6 6 下半年。这就是 5 月份，根据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8 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1 1 名常委中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排名第四，还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1 9 6 7 年 1 月，陶铸被打倒，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既表明了那个动乱年代的荒唐，也表明了毛泽东对陶铸之先褒后损、先用终弃。然而，这并不是陶铸完整的 1 9 6 6。他上半年呢？据笔者所知，他至少打

了李达“三家村”并致李达于死地。就是说，即使陶铸的1966，情况也很复杂，在档案未解密之前，实难全面观之。

积几十年之经验，笔者有一个成见：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运动治国的前三十年（实际27年），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先刘（少奇）后林（彪）直到国中的平民百姓，大抵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任何人是清白的（当然包括笔者）。就是说，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能挨批挨斗，任何人也可能充当打手（不包括只挨批斗、不充当打手者陈寅恪、梁漱溟等稀有国宝级人物），何况那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1966！这年下半年，陶铸大权在手，大红大紫；接着被打倒批“臭”，最后被迫害致死。然而，他这年的上半年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李达湖南零陵人，他们都属于现今永州市，是山水相连的老乡。可是，党内斗争无穷期，同志下手无轻重；还有道是“老乡整老乡，两眼泪汪汪”。“文革”伊始，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还有王任重）就把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给整的乌呼哀哉！

本来，1966年1月，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一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同志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1月16日，中南局作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陶铸作报告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富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月开始，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为宣传《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连续发表三篇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3月，李达指着《羊城晚报》特字号通栏大标题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直言不讳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助手提醒他说：“这是林彪同志说的，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说：“我知道，我不同意！”他还补充说：“‘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到顶了就没有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情况汇报上去，引起陶铸的不快。他本人就宣传过“顶峰”，他更要紧跟毛泽东，在毛亲自动员和领导的“文革”中，他还要“再立新功”！他和王任重终于对李达下手了！

4月10日，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他一反三个月前在中南局扩大会议发放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时的态度，不屑一顾地贬损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他转递毛泽东认为《唯物辩证法大纲》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是“大洋古”的信息：“毛主席说李达同志的书讲洋人古人的东西多，讲现代人的东西少。”接下来，他便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中共湖北省委迅速派出以书记处书记许道琦任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武大，很快整理、打印《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中共中央。

5月上旬，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又一次讲话说：“北京日报揭露以后，新的开头从这里开始，比57年要大，意义深远得多，要拿一定力量来搞，是百年大计，可以抽力量。”他强调说：“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12日，他在会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期间，陶铸虽然也说“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



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武大党委书记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

中共湖北省委 7 月 17 日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7 月 27 日，该部八处呈送中央书记处，8 月 1 日，常务书记陶铸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8 月 10 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他用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心中有数，同日照批照转：“即送任重同志”。但李达仍然被断医停药（自宣布他为“三家村”头目受批斗后，就停止了他的公费医疗，他要求自费治疗用药也未获准），直到他弥留之际的 8 月 22 日早上，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只三天，8 月 24 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由此可见，陶铸的 1966 至少不可或缺李达被迫害致死这件事。

□ 原载《共识网》2014-3-31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